

虎人卣中的商代长江流域 青铜技术与艺术渊源

苏荣誉 段西洋

[摘要] 传出于湖南省的两件虎人卣分别收藏在京都泉屋博古馆和巴黎色努齐博物馆，是商代青铜艺术中的代表性杰作。本文根据最新考察，特别是结合 CT 扫描结果，深入辨析虎人卣的结构、装饰、工艺和母题，分析其风格特征、艺术表达和技术特征，确定它们是一对南方风格浓厚之器，出自同一（组）铸工之手，铸造于长江流域青铜作坊，时代早于殷墟。本文由虎人卣延伸讨论商代长江流域与安阳之间的交流互通，及其在青铜器的器形、纹饰等中的体现，以便更好地诠释器形和纹饰极为复杂的器物设计、风格与工艺等等。

[关键词] 青铜器；虎人卣；南方风格；铸造工艺

虎在动物分类学上属于哺乳纲食肉目猫科豹亚科豹属，为亚洲特有的物种之一。虎共有九个亚种^①，其中三种已经灭绝。关于虎种的起源和扩散，学者提出了几种不同的看法，大体包括亚洲东北部及中国东北地区说、中国中原地区说，以及中国南方长江中游说。^② 显然，中国为虎种起源的关键地区。马逸清分析总结了 20 世纪以来发表的若干观点，结合我国出土的自更新世至全新世的虎遗存，明确了虎起源于第四纪的更新世早期，首先出现在黄河中游一带，其后向东北、西北和南方扩散。^③ 中国亦为虎种分布的主要地区，在其广袤的幅员下曾分布有六个亚种^④，目前仍有四个亚种分布于此，为世界之最；其中华南虎为中国特有，仅在中国分布，亦称为“中国虎”。

华南虎，俗称“白额虎”，栖息于亚热带森林，目前主要分布中心为我国的湖南省和江西省。古生物材料表明湖南自古即为华南虎的核心分布区域，慈利县笔架山硝洞和攸县店背溶洞的两件晚更新世的化石^⑤，证明最晚至距今一万余年以前，湖南地区已经具有广泛的老虎分布，何业恒认为它们就是华南虎的先祖。^⑥ 永顺县不二门遗址中出土虎骨遗存和牙齿标本表明，商周时期虎仍活跃在湖南地区，且与人类社会有所交集。^⑦ 这一推断也在人类社会所创造的物质文化中得到印证，其

作者：苏荣誉，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教授，bronzorongyu@qq.com；段西洋，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dddxyyy0930@126.com。

① Vladimir Mazák 于 1968 年提出虎共八个亚种；根据近年研究更新增加了马来亚虎为第九个亚种，参见李惠鑫等：《12 只虎的亚种鉴别》，载《野生动物》，2013（3）。

② 马逸清、文榕生：《虎（*Panthera tigris*）的起源与地理分布变迁》，载《野生动物学报》，2015（2）；曹志红：《老虎与人：中国虎地理分布和历史变迁的人文影响因素研究》，6-12 页，陕西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

③ 马逸清、文榕生：《虎（*Panthera tigris*）的起源与地理分布变迁》，载《野生动物学报》，2015（2）。

④ 高耀亭等：《中国动物志·兽纲·食肉目》，33-34 页，科学出版社，1987。

⑤ 何业恒：《中国虎与中国熊的历史变迁》，108 页，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⑥ 何业恒：《湖南珍稀动物的历史变迁》，43-45 页，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

⑦ 中国考古学会编：《中国考古学年鉴 2002》，294-295 页，文物出版社，2003。

中两件青铜虎人卣是表现老虎形象、虎人关系中最为精美别致的器物，体现出极高的工艺水平和审美趣味，是难能可贵的商周物质文化遗存。以往已有若干围绕虎人卣的讨论与研究，而本文再论，意在回归器物研究的基础。近些年的CT扫描分析结果，使其结构、装饰、工艺及两件器的关系、器物的时代和地域信息得以彰显并可资讨论。本文即是针对于此的探索，并以为之基础，结合相关器物，探讨商代长江流域青铜器对安阳殷墟的输出和影响。

一、泉屋博古馆虎人卣

16世纪以炼铜起家、四百年后成为日本四大财团之一的住友家族，第十五代家主住友春翠自明治二十三年（1889年）开始收藏中国古代青铜器，历经大正（1912—1926年）和昭和（1926—1989年）前期的日积月累，昭和三十五年（1960年）在京都建成了法人财团博物馆——泉屋博古馆，收藏、保护、展出和研究住友财团陆续蒐集的古代艺术品，总数超过3000件，其青铜器收藏蜚声国内外，在日本堪为翘楚。其中的一件商代虎人卣（编号：彝·六八）于明治三十六年（1903年）二月入藏。^① 清宗室爱新觉罗·盛昱的旧藏有一件虎人卣，罗振玉认为即是住友所藏那件，而滨田青陵（滨田耕作别名）的著录则略显含糊，认为可能系爱新觉罗氏所散出者。^② 此卣通高357毫米、口径104×90毫米、重5090克。^③

（一）造型

泉屋博古馆藏虎人卣（图1）形为一只大头圆身的虎，叶形尖耳立于头顶，口大张，眼圆睁，面容平和，目视前方；身体呈蹲踞姿态，前肢怀抱一人，后肢半蹲，与虎尾共同将器身托起。人置于虎口之下，侧首，正面贴附于虎前胸处，神色怡然，其双手攀抱虎前肢，双腿蹲作马步，脚踏在虎足上。虎后颈开口，立鹿作盖钮；提梁与器身相接于虎前肩处，提梁根部为类象的兽首。虎人卣可大体分为盖、身、座三部分，另有提梁。^④



图1 泉屋博古馆藏虎人卣

图片来源：泉屋博古馆：《泉屋博古·中国古铜器编》，80页，图版95，便利堂株式会社，2002。

虎人卣器表大部分以云雷纹作地纹，其上勾勒阴线纹的高浮雕纹饰，构成商中晚期至西周早期典型的三层花纹饰结构。以云雷地纹分界为据，虎人卣可分为盖、头、前肢、背、后肢几个部分，

① 汪莹：《从泉屋铜器看日本明治时期的中国艺术品收藏》，载《故宫学刊》，2015（2）。

② 罗振玉：《匍庐日札》，2-3页，光绪戊申年（1908年）。罗氏认为器作“一兽攫人欲啖状，殆象（像）饕餮也”。滨田青陵的编著图录，据《左传·宣公四年》虎乳楚子文故事，称之为“乳虎卣”（《泉屋清赏》卷2，六十八图，1911）。此后的图录皆延续滨田之说。内藤湖南称虬龙雷纹乳虎卣，断代为西周（《删订泉屋清赏》，71-72页，住友家族，1934），梅原末治先称为饕餮虬龙文乳虎卣（《日本集馆支那古铜精华》第1册，山中商会，第42号，1959），后称鹿钮盖乳虎卣（《新修泉屋清赏》，62-64页，泉屋博古馆，1971），断代均为殷。

③ 广川守：《泉屋博古：中国古铜器编》，80-81页，泉屋博古馆，2002。此图录称之“虎卣”，断代为西周前期。

④ 泉屋博古馆、九州国立博物馆：《泉屋透赏：泉屋博古馆青铜器透射扫描解析》，234页，图版80，科学出版社，2015。

另有提梁，亦作三层花纹饰。

虎头硕大，无地纹。叶形尖耳立于头顶，耳面内凹，勾随形阴纹轮廓，轮廓内饰鳞纹，双耳之间饰菱形阴纹。虎眼目视前方，杏仁形眼眶略下凹，高浮雕眼球颇为突出，中心圆形下凹为瞳孔；紧贴眼眶系弯月形高浮雕眉骨，以阴性斜线纹表现眉毛，眉毛上缘以阴线凹槽，加深边缘。虎鼻梁高挺，饰阴线纹；鼻头圆鼓而鼻尖较平，以很深的阴线表现鼻孔；鼻头边缘同样以较深的阴线强调轮廓。面颊略鼓，双眼下方各以阴线饰一对山形鳞纹；嘴上方饰均匀排布的点纹，表现胡须。虎口大张，与兽面纹中的“几”字形嘴相似；门齿共四颗，下缘中间略凹，表现锯齿，四颗门齿之间缝隙较宽，分隔清晰；侧面为犬齿，呈尖锥形，向内勾。两侧面颊饰随形抽象阴纹，弯卷部分与鳞纹带相接，似夔或蛇身，却不见头（图1）。

自虎耳根部，沿口沿至其中后方，再向下至虎后肢上方可见一周明显的地纹分界线。这一区域包括虎后颈、前肢以及人的上半身。在器口与提梁之间横置一浮雕夔纹，首向面前，上唇和鼻伸出较长，端部上卷，下颌内勾，无牙；眼珠圆凸，瞳孔下凹；叶形耳，饰阴线纹；夔身细长，中段拱起，下方相应出小勾，尾尖向上勾卷；夔首及身上饰随形阴纹（图2）。虎前肢可分为两部分，前半部被人手臂所覆盖，通过器面的凹凸起伏、地纹分界以及云雷纹单元大小的变化，将人的手臂与虎前肢明显区分开。虎臂后半部饰浮雕顾首龙纹。龙首回转，眼珠圆鼓，鼻头略卷，下颌内勾，饰随形轮廓阴线；眼后与嘴后方均填入小阴线纹饰。眼上方的眉饰阴线纹，中间出小勾；眉上方立瓶形角，勾桃心形阴线纹；头侧置叶形耳，耳尖略上卷，耳面饰十字阴线；龙耳上方又出一角，为双层设计，呈矩尺形；角前半段饰随形阴线，靠前处出勾；后半部被压于前者之下，本身又可分为两层。龙身随虎臂延伸，虎尾于爪根部向上勾起，与人手臂相接；龙身细长，中段拱起，下方对应处出小勾；仅作一条随形阴线纹饰。顾首龙纹的身下及头后分别饰小浮雕夔纹。身下方者为水平向，面前方，鼻微翘，下颌较短，略外翻，其口张，刚好对着顾首龙纹身下所出小勾卷；头后横置瓶形角，所饰阴线纹较简略；其身结构与形状，及所饰随形阴纹等均与顾首龙纹相同。另一夔纹垂直置于顾首龙纹的矩尺角下方，面后方；其基本形状与前一夔纹相似，但身体较短，瓶形角竖立于头顶，夔身饰短线纹。虎爪均三趾，呈浮雕状，以阴线凹槽勾出指甲形状，虎爪面饰三段较短的水波鳞纹（图1）。

人置于虎口之下，虎嘴角之间水平向的分界线与人耳平齐，表明虎口腔内无地纹。樋口隆康所撰图册中的仰角照片，揭露了虎口的上腔部分具有阴线纹饰（图3）。^①

人头部为圆雕，仅贴紧虎身一侧的耳朵为浮雕。人面塑造较为写实，眉弓、颧骨、鼻梁、上下颌骨等结构均得以体现，其面容平和，双眼自然睁开，直视前方，杏仁眼整体下凹，突出轮廓，中间系圆凸的眼球，瞳孔下凹；眼上方为凸起的弯眉，填斜线纹；鼻梁较低，鼻头圆钝，鼻翼较宽，颧骨亦较宽；点凹表现鼻孔，宽凹线表现人中，略长；颌骨突出，嘴巴平直，下巴短平；双耳于头侧呈C形并以阳线表现耳廓等结构。短发平齐，别于耳后，以均匀排布的线纹表现，贴附于头部。头部及脖颈无纹饰，肩部饰一周菱形纹饰带，似衣领。人手臂放在虎前肢上，又被虎前肢上装饰的顾首龙纹所叠压。手臂以云雷纹作底，又以略凸起的一层云雷纹构成夔纹浅浮雕。夔口朝前，眼珠圆凸，瓶形角下置小耳；夔身短小，身下有足，爪具三趾；身下前后出相对的两小勾，尾尖上勾。人手腕饰阴线羽刀纹，手四指，以下凹表现指甲。人面和手臂之间有一蛇纹，尖尾手指上方，而头靠近人，双目圆凸，瞳孔点凹，蛇身饰一条随形阴线。人背部两侧被虎爪所覆盖，中间为兽面，除双目外，均与地纹平齐。兽目呈方形，中心做短横线瞳孔；目上方眉勾阴线；眉上方立叶形耳，

^① 李学勤认为该纹饰为云纹，参见李学勤：《试论虎食人卣》，载四川大学博物馆、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编：《南方民族考古》第1辑，39页，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

耳面饰十字阴纹，耳尖外翻；兽鼻较宽，嘴角外撇（图1）。

虎背部饰以扉棱对称的大兽面。兽眼硕大，阴线勾眼形，眼珠圆凸，瞳下凹，外侧眼角下方布小C形阴线纹饰；眼两侧为耳，人耳形，勾阴线纹，中心点凹，或表现耳蜗；耳下方有小圆鼓，作阴线卷纹。眼上方为平直的眉，勾阴线；眉上方作浮雕牛角，中心凸起甚高，而两侧渐平缓；牛角前半平直，角尖上扬，勾随形阴线及鳞纹；牛角上方又出一N形下卷方卷角，与兽面其他部分相较，方卷角略平，但内卷的角尖凸起很高。双角与扉棱之间留有空隙，填阴线云纹；下方为眉毛之间的阴线菱纹，再下方为鼻梁，又以阴线作纹，左右两边略错位。兽鼻圆钝且宽，阴线勾卷表现鼻翼；兽面嘴角外撇，尖牙交错。扉棱平直，侧面勾I形和T形阴线，与虎尾上的扉棱为一体，但于兽鼻与虎尾相接处出鳍（图4）。

虎下蹲，以尾与前足共同支撑。这一部分还包括踏于虎爪之上的人的下半身。虎腿一臀饰浮雕虎纹。虎纹眼圆睁，眼珠凸起很高，瞳孔下凹，阴线勾眼廓；口向下，鼻下卷，颌内勾，饰随形阴线；头顶桃心形耳。身健硕，中段下凹；背上出两鳍，位于肩部和腰下凹处；身下有两足，爪团起，下面两趾勾蜷，一趾于上方翘起。尾较长，随形下垂，尾梢略卷。由阴线一分为二，上半部饰点纹，下半部饰阴线卷云纹。浮雕虎纹的尾巴和人足之间有一倒立夔纹，夔首大而身小。夔面前方，眼圆凸，口朝下，头顶立叶形耳，勾十字阴纹。虎足呈合瓦形，外侧以阴线勾桃心形凹槽，表现尖爪，共五趾；内侧亦见短阴线，表现指缝。虎尾粗壮，末端卷起呈U形；根部较宽，与背上兽面的鼻相连，至尾尖渐细，饰阴线水波鳞纹；扉棱与兽面扉棱同，两侧勾I形和T形阴线（图1）。



图2 泉屋虎人卣口沿处纹饰



图3 泉屋虎口腔内壁纹饰



图4 泉屋虎人卣背面

图2来源：作者摄。图3来源：樋口隆康（泉屋博物馆）：《酒器》I，33页，便利堂株式会社，1984。图4来源：泉屋博物馆：《泉屋博古·中国古铜器编》，81页，图版95，便利堂株式会社，2002。

人下体跨蹲，自臀至膝饰蛇纹；蛇头回转，面向外；阴线表现眼睛、额头菱纹及鼻；蛇身长且弯，饰阴线三角纹；蛇尾于人膝盖处向下内卷。人脚腕纹饰与手腕相同；脚共四趾头，指缝下凹明显，同时脚趾隆起；脚边缘作较深的凹槽，轮廓清晰（图1）。器盖椭圆形，圆雕立鹿作盖钮。鹿四足站立姿态，面前方；额较圆，眼圆且上方有短线眉；口鼻长，端部圆钝；双耳尖长，向两侧张开，耳面内凹；长角呈倒八字张开，分叉残断，角尖尖锐并稍向内弯。鹿身饰阴线纹和点纹；鹿蹄为圆柱形，阴线表现偶蹄；鹿尾短粗。立鹿盖钮后方设一小段扉棱，与器身扉棱相同（图1、图4）。盖钮两侧对称置浮雕夔纹，夔面向前方，口大张；圆眼突起，瞳下凹；头后设叶形耳；夔身短小，身下出两鳍；尾与身之间以阴线分隔，尾向上勾卷；夔身与尾分别作阴线纹（图4）。

提梁呈“几”字形，横置，与器身相接于虎肩部。器肩出榫，提梁作象形兽首将其包裹。象首两侧有叶形耳，勾十字阴线；额饰阴线菱纹，两侧又以阴线形成圆突；杏眼下凹，眼珠凸起，点瞳孔；阴线弯眉、鼻上饰水波鳞纹；鼻较短，向上卷起；嘴咧开，两侧嘴角向下龇出短尖的象牙。提梁内侧无纹饰，外侧于云雷地纹上饰四组均等的浮雕夔纹，夔首向提梁中央。提梁上的夔纹与口沿处夔

纹如出一辙，然口略有不同。此处夔纹口朝前，鼻（或上唇）较长且前端上翘，下颌同样前伸。

虎人卣外底有纹饰，以单阴线作俯视平展的龙纹。^① 龙首平展如兽面，方形眼珠凸起，中间凹下表瞳孔；眼上有眉，眉中间为菱纹；鼻梁系阴线纹，鼻翼勾卷；龙头两侧出叶形耳，饰十字阴线；头顶立瓶形角。身与头相连，细长弯卷，饰一系列山形鳞纹；身两侧出爪，腿粗壮，各四趾，其中三趾下勾，一趾翘起。尾盘卷，一侧可见直条形鱼纹，另一侧较模糊（图5）。

（二）铸造工艺

虎人卣制作精美，铸后加工亦十分细致，器表打磨平整，几乎无明显的凸起分型线。自器正面，虎耳边缘可见披缝，虎鼻头处可见披缝打磨痕迹，与人头部发际线位于同一条延长线上，沿人耳边缘向下至人背部兽面及臀部处，可见较为清晰的对开分型披缝（图1）。器身侧面不见连续的纵向分型披缝（图1）。器后面于扉棱上可见披缝被打磨的痕迹（图4）。器底分型线应位于边缘一周，连接后足及虎尾内壁。足底呈开放式，可见足内泥芯略经处理；虎尾底侧亦然，暴露出凹槽内的泥芯已掏净（图5）。器盖与身应为子母口相合，子口厚度不详。立鹿盖钮上不见明显的分型痕迹，但四肢内侧较平且可见连续的铸造披缝（图1）。提梁内边缘可见披缝；右侧提梁根部兽首额顶圆鼓之间可见透孔，嘴角和尖牙上有未打磨彻底的披缝（图6）。



图5 泉屋虎人卣器底图



图6 泉屋虎人卣右侧图

图5来源：樋口隆康（泉屋博古馆）：《酒器》I，33页，便利堂株式会社，1984。图6来源：作者摄。

《泉屋透赏》对泉屋虎人卣透射扫描的解析包含了几点重要信息。首先，泉屋虎人卣内壁随器形轮廓凹凸，保证壁厚一致。其次，器背部壁厚很薄，虎尾亦然，而虎口至人头部区域较前二者略厚；虎耳及扉棱为实心。其三，提梁两端象首包裹榫头，内部为钉头状，无打磨痕迹。虎尾、后足及立鹿盖钮均为空心。^② 另外，根据泉屋博古馆酒器图录，虎口内阴线云纹处可见铸造披缝，上可与虎门齿之间缝隙处的短阴线相连，下与由人首发际线至耳及背的这一条披缝相接，说明虎口内空腔与人首部分同使用了两块相对合的小范。^③

综合以上观察及分析，泉屋虎人卣器身应为沿背和尾上扉棱、鼻梁、人发际线、背中缝左右对开分型。虎耳部分使用活块范，而虎耳边缘所见多处明显的缺口应与该活块范翻制过程相关；虎口内嵌两块小范，在人头部与外面的大范相接。器底用一整块椭圆形底范，两侧做出虎足内侧，与外范相接呈合瓦形，且后端与虎尾内侧泥芯相接。

器盖左右分型，盖钮与盖整体浑铸。立鹿盖钮腹底与四足内侧共用一块底范，头与身，沿中线左右对开分型，分别与盖面左右两范相接。提梁部分后铸，内外分范；两端兽首紧扣于器身两侧伸

① 其身极长，因此在此前研究中多视其为龙，例如李学勤研究中称其为“游龙”。李学勤：《试论虎食人卣》，载四川大学博物馆、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编：《南方民族考古》第1辑，39页，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

② 泉屋博古馆、九州国立博物馆：《泉屋透赏：泉屋博古馆青铜器透射扫描解析》，234-235页，科学出版社，2015。

③ 樋口隆康（泉屋博古馆）：《酒器》I，32-33页，便利堂株式会社，1984。

出的钉头凸榫；兽首沿耳边缘先后分型，内凹的口部另需一底范，可解释象牙呈片状；象首顶部透孔或为固定内芯所设。卣内芯为整体，虽为保持壁厚一致而内壁随形，不见分隔，仅后足内芯及虎尾处外露的泥芯不与器身泥芯相连。

二、色努齐博物馆虎人卣

（一）造型与装饰

色努齐博物馆藏虎人卣（图7）与泉屋虎人卣在造型、纹饰内容和风格等方面高度一致，仅存在细微差别。法国学者叶理辅（Vadime Elisseeff）对色努齐虎人卣进行了较为细致的观察和描述，并指出了其与泉屋虎人卣在器表装饰方面存在的四点区别。^①

首先，色努齐虎人卣的门齿之间并未完全断开，由空隙可知本意分为四颗，而泉屋虎人卣的门齿之间间隙较大，明确分为四颗。其次，色努齐虎人卣的人背部为云雷地纹，而泉屋虎人卣则为兽面纹（图7）。其三，色努齐虎人卣中人耳具有长耳垂及耳洞，泉屋虎人卣中仅为一对C形的圆耳（图8）。最后，两件虎人卣的外底均饰龙纹，龙纹两侧再填鱼纹。色努齐虎人卣器底的鱼纹与龙纹同向，而泉屋虎人卣则不同。针对第四点，李学勤作出进一步的说明，即泉屋虎人卣器底鱼纹为向后的。^② 由于泉屋虎人卣器底右侧的纹饰情况不明晰，因此，亦有学者将叶理辅的这一观察解释为泉屋虎人卣器底仅见一处鱼纹。^③ 因泉屋虎人卣器底纹饰情况略模糊，借色努齐虎人卣器底照片对鱼纹进行简单描述。鱼纹呈直条状，分隔为头、身、尾三部分；头部以点作眼，鱼嘴下勾；鱼身饰三鳞纹；鱼尾分为上下两片。此外，鱼背上出一较大鳍，填斜线纹；身下又出两小鳍（图9）。



图7 色努齐虎人卣



图8 色努齐博物馆藏虎人卣



图9 色努齐虎人卣器底

图7、图8来源：色努器博物馆官网：<http://www.cernuschi.paris.fr/>。图9来源：Vadime Elisseeff. *Bronzes Archaiques Chinois au Musée Cernuschi vol. I-Tome 1. L'Asiatheque*, 1977, pp. 122-131.

另一位较早将两件虎人卣进行对比观察并记录者为日本学者林已奈夫。他同样注意到人耳、背部纹饰以及器底鱼纹首向的差异，除此之外，他还提出了另外六处差异。首先是盖钮鹿角形态有异——泉屋虎人卣的鹿角断裂，但仍可辨其为树枝形角，而塞努奇虎人卣中的鹿角短尖。^④ 事实上，通过多角度的细节判断两件器的鹿角应原本造型相同，色努齐虎人卣中的鹿角同样在接近端部的位置有一处转折，但处理得更为平滑（图10）。前文对泉屋虎人卣的描述可佐证林已奈夫所提出

① Vadime Elisseeff. *Bronzes Archaiques Chinois au Musée Cernuschi vol. I-Tome 1. L'Asiatheque*, 1977.

② 李学勤：《试论虎食人卣》，载四川大学博物馆、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编：《南方民族考古》第1辑，39页，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

③ 张昌平：《吉金类系——海外博物馆藏中国古代青铜器（一）：虎卣》，载《南方文物》，2011（2）。

④ 林已奈夫：《欧洲博物馆所见之中国古代青铜器若干について》，载松丸道雄等编著：《甲骨学》第12号，155-156、180-185页，日本甲骨学会，1980。

的残断的树枝形角的说法。因此，色努齐虎人卣中较为平滑的鹿角可能曾经经过修整。在色努齐虎人卣立鹿盖钮鹿角的内侧可见一些疑似补铸的痕迹，然而需要更为清晰的证据才能够揭开两件虎人卣鹿角差异背后的真正原因。

林已奈夫指出的第二点差异为，位于提梁后方与器盖之间的小夔纹在泉屋虎人卣中具有长而伸展的鼻头^①，而在色努齐虎人卣中则是长着鸚鵡一般的勾喙。事实上，该夔纹身上的纹饰亦不同——泉屋虎人卣中为一条随形的阴线，而色努齐虎人卣中使用了均匀排布的短线纹（图 11）。其三，泉屋虎人卣与色努齐虎人卣位于眼睛下方的鳞纹设置分别为两个和一个。其四，顾首龙纹后方的夔纹角不同——泉屋虎人卣中为茸形角，一般称为瓶形角；色努齐虎人卣中为叶形耳。^② 其五，泉屋虎人卣的虎前爪较平，后者作浮雕。最后一点则是两件器物的尺寸略有不同。

事实上，两件虎人卣还存在着一些其他的细微差别：泉屋虎人卣中虎侧颈上以阴线而作的半截蛇、夔身及卷尾内所填的水波鳞纹，一侧朝上呈 W 形，一侧向下呈 M 形（见图 1），而在色努齐虎人卣中，该处鳞纹在两侧均是向下排列的（图 7）。另外，色努齐虎人卣左侧面部的阴线纹饰中增加了一个小纹饰，这一做法在右侧面部以及泉屋虎人卣中均不见。从工艺角度分析，这种细微处的调整说明两件虎人卣应不是同模制作，器表起伏变化上的微小差异足以造成饰纹空间的扩大或压缩，因此出现意外的空白。



图 10 色努齐虎人卣盖及立鹿钮



图 11 色努齐虎人卣口沿处纹饰

图 10 来源：色努器博物馆官网：<http://www.cernuschi.paris.fr/>。图 11 来源：作者摄。

（二）铸造工艺

色努齐虎人卣尚未见相关的检测材料。根据图片观察，其分型以及附件的铸造方式与泉屋虎人卣小异大同，但部分铸造披缝更为明显，例如人首发际线沿耳缘向下至背部及臀（见图 7）；又如盖面左右分型，及鹿钮四肢内侧的披缝（图 10）。

色努齐虎人卣也提供了一些在泉屋虎人卣中相对模糊或缺失的信息。例如博物馆官网提供的器盖图，以及色努齐图录中器底图可见边缘一周清晰的分型线、后足内部以及虎尾内的泥芯等。

三、两件虎人卣属性

青铜虎人卣的内涵丰富，关涉的内容很多，但风格、技术以及二者所蕴含和体现的时代、产地属性最为重要，需要先行探讨。

（一）风格属性

尽管形状特殊，但虎人卣仍继承了商周青铜器所具备的极强的造型整体性和对称性。对称性表

^① 原文中使用日语“鼻面”一词，指动物的鼻尖，在这类夔纹中该部位亦有时被视为上唇。

^② 李学勤文章中引用林已奈夫的对比，举小夔纹中角的不同为例，但所述为“虎体侧顾首龙纹头后和身下的两处夔纹”，应为误读，因两件虎人卣中，横置于顾首龙纹下方的夔纹均为瓶形角。

现在除侧首的人头部外,整个虎人卣,包括盖钮和提梁一类附件在内,在形状、结构、纹饰布置上均对称。整体性则表现在虎人相抱的复杂结构融合得十分紧密,器形大体呈椭圆。因顶部开口,且具有提梁,较为接近卣的形制。然而,对比传统的卣形器,器形上很难与一般的卣建立联系。关于虎人卣形制和定名的对应问题,张昌平此前做过简短的讨论。^① 本文认为,对虎人卣的形制和定名思考可以延伸 to 大部分的动物形器,对此将另外为文讨论。

根据传统器物形,动物形器可分为三类。第一类完全保留了原始器型的结构;第二类在融入动物形状的同时,原始器形依旧可辨;第三类则彻底地以动物为形。^② 可与虎人卣同归于第二类的还有另一对长江流域出土的商代动物形青铜器双羊尊,以及安阳地区出现的鸟形尊和卣。值得注意的是,安阳的鸛卣通常相似度极高,不乏作为成组器的可能;而双羊尊与虎人卣几乎可以确定是目前已知铜器中唯有的南方地区成对动物形器。前者同样流失海外,目前分别藏于大英博物馆和根津美术馆。两件尊的造型风格高度一致,在细微处存在着若干差别,苏荣誉在日本学者三船温尚研究的基础上,从造型纹饰和工艺痕迹两方面对比分析了两件双羊尊的差异,综合考虑判定二者为成对器。^③ 双羊尊与虎人卣的出现极为重要,因商中晚期集中出现在以湖南为中心的南方地区的四足动物形器均为独件。双羊尊、虎人卣以及安阳出现的鸛卣均属于“第二类象生动物形器”,即原本的器形与所表现动物的形状较为均衡、均匀地融合——原始器形得到了一定地保留,同时所表现动物也构成了新器形的一部分,而并非简单的附加装饰。^④ 是否在动物形器中,具体的形制类型与成对、成组的现象存在潜在的关系?至少目前可以确定的是,从以虎人卣、双羊尊为代表的第二类动物形青铜器到以醴陵象尊等第三类动物形青铜器,并不能推测为历时性的发展演化。另外,可合理推测制作成对动物形器的做法在商中晚期同一些其他的南方青铜器特点一并传入安阳^⑤,为妇好墓中出现的大量对器、组器之先声。

表现写实、立体的动物造型已经被广泛认定为商代长江中下游地区青铜器特征之一,这一观点较早出现在高至喜^⑥、凯恩^⑦、贝格利^⑧等学者的研究中。他们意识到商代的长江流域并非仅仅为中原青铜文化向外辐射过程中的接收方。熊传薪将湖南地区的青铜器分为三类,即中原型、地方型和混合型,指出商代南方地区青铜器的文化复杂性。^⑨ 随着越来越多南方青铜器的出土以及相关研究的跟进,学界已明确长江流域出土的一部分青铜器在器型、体量、装饰、合金成分等各方面都具有十分鲜明的区域特征。苏荣誉等对青铜器铸造技术的研究则揭露了在块范法的大格局之下,长江流域青铜器在其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区别于中原青铜器的工艺细节,例如器壁随形、牺首的榫接式后铸^⑩、盖钮铸铆结构等。^⑪

贝格利曾在其关于商代南方青铜器的讨论中明确指出,虎是除了鸟之外最受南方青铜工匠青睐

① 张昌平:《吉金类系——海外博物馆藏中国古代青铜器(一):虎卣》,载《南方文物》,2011(2)。

②④ 段西洋:《商周时期的象生动物形青铜容器——以晋侯墓地出土器为重点》,4、2页,广州美术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22。

③ 苏荣誉:《商代青铜羊尊的艺术与技术研究》,载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湖南考古辑刊》第15集,226页,科学出版社,2021。

⑤⑪ 苏荣誉:《妇好墓青铜器与南方影响——殷墟青铜艺术与技术南方来源与技术选择新探》,载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编著:《商周青铜器铸造工艺研究》,1-68、1-68页,科学出版社,2019。

⑥ 高至喜:《“商文化不过长江”辨——从考古发现看湖南的商代文化》,载《求索》,1981(2)。

⑦ Virginia C. Kane. “The Independent Bronze Industries in the South of China Contemporary with the Shang and Western Chou Dynasties”. *Archives of Asian Art* vol. 28, 1974-1975: 78-80.

⑧ Robert W. Bagley. “A Zun from Yangxian”. In Cao Wei (ed.). *Shang Bronzes from Hanzhong*. Ba Shu Shu She, 2011, pp. 570-600; 贝格利:《一件来自洋县的尊》,载曹玮编著:《汉中出土商代青铜器4》,601-625页,四川巴蜀书社,2011。

⑨ 熊建华:《湖南商周青铜器研究》,35页,岳麓书社,2013。

⑩ 苏荣誉、李建毛:《华容大口折肩青铜尊研究——兼及挂饰管形牺首饰诸器》(下),载《美术研究》,2017(1)。

的动物形象，大量出现在青铜器的器耳附饰、器盖钮、器表高浮雕纹饰中。^① 虎与长江流域关系紧密，例如江西新干出土了伏鸟双尾虎、乳钉纹虎耳方形青铜鼎等器；金沙地区也发现了若干的石虎，亦构成了这一地区的文化特征。然而，不论在湖南、江西还是金沙，不论其为石制还是青铜，虎几乎都是表现为四肢伏地的静止姿态。虎人卣这种以尾巴做支撑、后肢蹲踞的姿态无论是在商代青铜艺术还是现实世界都是几乎不见的，这也是有学者将虎人卣视为饕餮的原因之一。然而，头顶立耳，锐利弯曲的巨大犬齿、凿子形的门齿、口周表现胡须的点纹等细节均将其身份指向虎；而在兽面中头顶通常为角，耳展于两侧，因此视其为饕餮并不妥当。

相较于虎形或虎饰器，虎人组合在商代青铜器中更为特殊，应具有地域指向性。施劲松系统地整理了具有虎人图像的商代青铜器^②，其中以分别出土于安徽阜南月儿河^③和四川广汉三星堆^④的两件大口折肩尊最为突出。在这两件尊中，虎人图像以浮雕的形式出现在尊的腹部。虎作侧视，身体一分为二，分别向两边展开；虎头为圆雕，而虎身作高浮雕，形式与常见的虎纹基本相同。人被置于虎口之下，作高浮雕，因虎头立体性更强，构成了纹饰的前后关系，人被含入虎口的情节得以传递。人身体平展，仿如趴伏于器壁，而虎人卣则是人趴伏在虎身。凯恩的研究认为大口尊起源于中原，自安阳早期发展至安阳中期，这一器物形制传入南方地区，于是出现了龙虎尊这样的纹饰具有强烈南方地方风格，且形制变化无法被放置于安阳大口尊发展序列中的情况。^⑤ 两件龙虎大口折肩尊从形制到纹饰，处处体现着地方性。作为其腹部主体纹饰的虎人图像也就自然而然地与商代南方风格建立了关联。施劲松对虎人图像溯源，将所知具有虎人图像的器物进行年代排序，发现南方出土器的年代普遍早于安阳。另外，妇好墓中出现的两例虎人图像均为阴线构成的平面纹饰；且在司母戊方鼎中，虎人图像进出现在鼎耳外侧这样占比很小且较为次要的位置。由此，施劲松认为虎人图像最早以立体的形式出现在商代的南方地区。^⑥

虎人卣器身高浮雕纹饰以夔纹居多，这些夔纹的结构和形态基本相似，与虎纹以及器底纹饰亦相似。首先，虎人卣中夔纹均为侧面表现，这也是夔的形象在青铜器中一贯的表现方式，甚至在占据鼎足这种立体部分时亦选择平面的侧面形象，如妇好墓出土的夔龙纹扁足方鼎。夔纹形态较为多变，而虎人卣中的夔纹基本结构一致，大眼、张口、头顶或头侧具叶形耳或瓶形角、身体呈S形、身下出小勾应为足。对比夔纹与虎人卣后肢上的虎纹（图1），其实二者的头部十分相似，最为重要的区别在于虎纹有前后四肢，而夔纹仅在身体中央的位置出一对足^⑦，并且虎纹的四肢表现并非爪，而是具有关节的腿与足。其次，虎的身体虽然同样为曲线形，但在起伏中可以清晰地看出虎的肩、腰、臀、尾的结构，而非夔纹中如蛇一般的细长身子。第三，虎无角，且耳朵的形状一般为心形。湖南醴陵出土的象尊中，有一虎纹的立体形象，即位于象鼻前端的伏虎，其形象与虎人卣中的高浮雕虎纹几乎完全一致，除前者爪为团握状。

除浮雕纹饰外，虎人卣中许多阴线纹饰的使用也表现出强烈的南方风格。例如在长条状区域填用水波鳞纹，这类鳞纹在醴陵象尊以及与其关系密切的另两个传为南方地区出土的商代象尊中被大量使用。^⑧ 高本汉曾对鳞纹进行系统地整理和分类，论述其发展演变历程，指出鳞纹与动物之间的

① Robert W. Bagley. "Bronze Casting in the Middle Yangzi Region". In *Shang Ritual Bronzes in the 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s*. The Arthur M. Sackler Foundation and the Arthur M. Sackler Museum, 1987, pp. 35 - 36.

②⑥ 施劲松：《论带虎食人母题的商周青铜器》，载《考古》，1998（3）。

③ 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青铜器全集》第1卷，图版一一八，文物出版社，1996。

④ 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青铜器全集》第13卷，图版八七，文物出版社，1994。

⑤ Virginia C. Kane. "The Independent Bronze Industries in the South of China Contemporary with the Shang and Western Chou Dynasties". *Archives of Asian Art* vol. 28, 1974 - 1975: 85 - 107.

⑦ 在夔纹和虎纹的侧面展示中，通常以一足表现左右一对足。

⑧ 段西洋、苏荣誉：《论商代象尊》，载《南方文物》，2021（1）。

密切联系。^① 华盛顿弗利尔博物馆的研究也指出商晚期鳞纹被用于填充长条状的纹饰区域。^② 另外, 顾首龙纹头侧的双层矩尺角、背部扉棱上深凹却不透空的 I 和 T 形阴线、短线装饰的眉毛、提梁两端兽首额顶圆凸等, 也同样地出现在醴陵象尊、衡阳牛尊等具有考古出土背景、代表商代南方风格的动物形青铜器中。

(二) 工艺属性

从工艺特点上分析, 泉屋虎人卣器壁极薄, 且内壁随形, 反映出工匠高超的塑形和铸造技术, 属于典型的南方青铜工艺。尽管从外壁所见的铸造痕迹分析, 泉屋虎人卣与色努齐虎人卣的分型以及提梁铸接的方式应相同, 但在缺少更多检测信息的条件下, 不能根据目前所见的一致性而判定更多工艺方面的情况, 例如色努齐虎人卣的壁厚和内壁随形情况、提梁的连接方式等。参考与虎人卣同为成对器的双羊尊, 后者具有一些不同寻常的工艺差异。根据透射扫描的结果分析, 根津双羊尊除了具有更多的铸造缺陷之外, 在铸造细节上与大英双羊尊存在着内在的差异。例如根津双羊尊的内壁较为平坦, 器壁随形情况不明显; 根津双羊尊的羊首为实心, 而大英双羊尊中为空心, 且具有将羊首与器身相隔开的挡板等。^③ 根据目前所掌握的信息, 虎人卣也极其可能同双羊尊一样, 在基本工艺相同的情况下, 存在一定差异。例如, 在泉屋虎人卣的工艺分析中曾提到提梁两端兽首的额顶可见透孔, 可能是为固定内部泥芯而设计 (图 6)。在色努齐虎人卣中, 提梁一端不见这一工艺现象, 左侧额顶披缝痕迹尚存且完整, 可以排除工匠或古董商后期补铸将透孔盖住的可能; 而另一端, 在额顶靠前的位置可见圆孔, 却不透空, 露出泥芯 (图 12)。色努齐虎人卣的象首内泥芯的固定方式, 甚至其包裹的凸榫情况或许有异于泉屋虎人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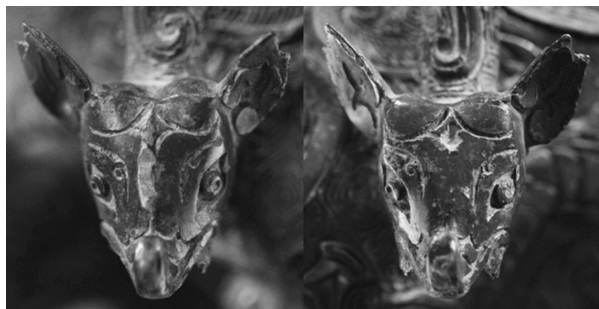


图 12 色努齐虎人卣提梁根部兽首

图片来源: 作者摄。

虎人卣的工艺讨论也涉及成对器的制作方式。王全玉根据两条工艺分析得出大英博物馆藏双羊尊较根津的双羊尊在工艺上更为成熟、复杂。^④ 由此分析, 两件双羊尊或为同一工匠先后制作, 或如苏荣誉推断为相关联的不同工匠所做。根据现阶段的分析, 虎人卣的情况很可能与双羊尊相同, 即非同模制作。关于一模多器的设想并不新鲜, 因为尽管在通常情况下, 青铜范铸过程中的范是无法二次利用的, 但只要使用得当, 理论上模是可以反复使用的。然而, 至目前为止, 商和西周青铜

① Bernhard Karlgren. "Some New Bronzes in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In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No. 24.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iquities, 1952, pp. 11 - 26.

② John Alexander Pope, et al. *The Freer Chinese Bronzes Vol. I Catalogue*.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1967.

③ 苏荣誉:《商代青铜羊尊的艺术与技术研究》, 载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湖南考古辑刊》第 15 集, 218、224 页, 科学出版社, 2021。

④ Quanyu Wang and Sascha Priewe. "Technical Investigations of Three Bronze Vessels from Southern China: Two Double-Ram Zun Vessels and A Pou Vessel". In *The Bulletin of the Nezu Museum Shikun Vol. 8 Special Feature: Current Research on the Double-Ram Zun*. Nezu Museum, 2016, pp. 39 - 58, pp. 142 - 154.

器中均没有出现两件或多件完全一致的案例。这种完全一致所指为器物在形状、体量、纹饰等各个方面均在小尺度下仍然一致。^① 王全玉在东周时期的侯马系青铜器中找到了答案——三件来自浑源李峪的侯马风格青铜鬯尊。该研究中给出的数据表明这三件器物在鼻至尾间距、腹围、后足间距、耳间距以及重量几个方面的数据几乎达到了完全一致。^② 然而，即便这三件器物制于纹饰翻印复制工艺和流程都极其成熟的侯马铸铜工业中，仍存在着一些肉眼可见的差异，例如尾巴的位置。作者详细地给出了多种解释，包括二代模的应用、祖模磨损后经修整、外范组合时的角度差异等。^③ 究竟哪些差异可以被判定为误差，哪些差异可以直接说明两件高度相似器并非同模？一方面寄希望于未来考古更多成对器的发现，另一方面则是借助更多技术手段获得更为直观、确凿的证据。

工艺讨论中另一值得关注的问题为垫片的使用。垫片为范铸技术中十分重要的一个工艺元素，其发明和使用极大地方便了工匠的设计，也提高了成器的质量。此外，有关研究认为，相较于中原青铜器，商代南方青铜器中较多地出现非必要的青铜垫片使用，即滥用，为南方青铜生产特点之一。^④ 包括《泉屋透赏》在内的研究中均未提及垫片。原因可能为两件器物分藏于海外，而图片资料的角度和清晰度有限，判断垫片痕迹较为困难。就现有资料，在泉屋虎人卣的鼻头、人面部以及虎的左后爪等位置可注意到较为规则的方形，疑似垫片；色努齐虎人卣的鼻头和人面部相同位置亦出现疑似痕迹，但不如前者明显。此外，在泉屋虎人卣的虎左后足外侧所饰的倒立小夔纹上，可见一块方形的纹饰空缺，如今已覆满绿锈，对比其右侧及色努齐虎人卣可知，此处原本是夔纹的一部分身体（见图1）。因此，可以合理推测，某一垫片漂移至此，将范上纹饰遮挡，导致这一现象。然而，以上所指出的垫片，除偏移一例外，均出现在无地纹的光素部分，器表大面积覆盖的云雷地纹没有被垫片打破的情况。在泉屋虎人卣臀部的虎纹中，其叶形耳上的方形空缺似乎也是垫片剥落所导致，两边虎纹对称着出现同一情况加强了这一推测的可信性。不过，出现在高浮雕纹饰上的锈蚀对器表观察造成了较强的干扰。一方面其剥落易被误认为垫片，另一方面也很可能掩盖了垫片。因此，若想要进一步地了解垫片的使用和分布情况，对两件器物进行精细地X光射线扫描十分必要。

（三）年代与产地

虎人卣自出现以来便伴随着出自湖南的传闻，其表面十分典型的“黑漆古”，更加证实了其南方来源。高至喜将虎人卣的出土地具体到安乡县^⑤，尔后有研究进一步地指出这对卣出于宁乡汤山脚下，与安化交界处。^⑥ 其表面强烈的三层花纹饰风格将年代限定在商晚至西周初，学界较为一致地将虎人卣视为晚商南方青铜器。

综合以上风格和工艺分析，两件虎人卣器表满布纹饰，属于典型的三层花、多种动物搭配型，并辅以圆雕动物附饰为装饰；无论器形还是纹饰，均具有多种南方元素。器壁极薄，壁厚一致，内壁随形，为模芯合作，其工艺上达到了商代南方作坊的巅峰。两件虎人卣结构相同、大小接近，并在目前可分析的工艺部分表现出一致性，二者应出自同一（组）铸工之手，成对铸造，成器时间为殷墟之前。

四、虎人卣中所见商代南方青铜文化对中原地区的影响

随着越来越多中原以外地区具有强烈地方性特征的青铜器的出现和研究，学界已经不再将商代

①②③ Kin Sum (Sammy) Li, et al. "Decorated Models, Replication, and Assembly Lines for Bronze Industrial Production in 500 BCE China". In *Early China Vol. 44*.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1, pp. 109 - 142, pp. 109 - 142, pp. 109 - 142.

④ 苏荣誉、胡东波：《商周铸金中垫片的使用和滥用》，载《饶宗颐国学院院刊》，2014；苏荣誉：《见微知著——中国古代青铜器的垫片及相关问题》，载吕章申主编：《国博讲堂（2013—2014）》，115 - 16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⑤ 高至喜：《“商文化不过长江”辨——从考古发现看湖南的商代文化》，载《求索》，1981（2）。

⑥ Vadime Elisseff. *Bronzes Archaiques Chinois au Musée Cernuschi Vol. I-Tome 1*. L'Asiatheque, 1977, pp. 128.

的青铜文化简单理解为单点辐射的发展,而是以中原为中心的同时,各地区青铜文化互通、交流,形成了十分复杂的局面,甚至出现了中原吸纳地方特征的情况。《妇好墓青铜器与南方影响》等文更是通过工艺技术的讨论,说明了商代南方青铜铸造技术的北传,以及其传入北方后,安阳工匠的技术选择问题。^①既然虎人图像源于长江流域,出现在安阳的虎人图像便意味着传播和引入,但其不同于某种纹饰或某类工艺。虎人图像组合的纹饰意义一直是虎人卣研究的重心,对其内涵的解读通常结合了考古学发现和历史学研究。

最先对虎人卣展开研究的以两件器物所在博物馆为首。泉屋博古馆针对其馆藏文物出版了《泉屋》系列图录。作为馆藏精品,每版图录均收录虎人卣,包括1934年出版的《删订泉屋清赏》、1971年出版的《新修泉屋清赏》以及2015年出版的《泉屋透赏》。其中《泉屋透赏》以工艺探究为主,前文工艺讨论部分已引。前两本著录则是记录了日本学者早期对虎人卣的认识,也反映了当时日本学者对中国古代青铜器的研究方法和角度。

《删订泉屋清赏》由内藤虎次郎(即内藤湖南)组织编撰。彝器综述部分由滨田青陵撰写、铜镜概述由梅源末治撰写。内容为已经出版研究和文章的修改、校正;鉴于整体的编校也由滨田与梅原负责,因此可以认为图录内容为二人的共识。^②虎人卣在此图录中被称为“虺龙雷纹乳虎卣”,其中“乳虎”二字道出日本学者对虎人图像的理解和阐释,即哺乳场景。其主要依据来自《左传·宣公四年》——若敖之孙子文被邲夫人,弃于“梦”,由虎哺育。^③虎人卣的图像结构让人十分容易联想到子文的故事,但研究者也没有就此断定这一说法。描述指出虎人图像也不可排除为饕餮食人的场景,从形态上分析,器物的主体部分难以被确定地辨别为虎,饕餮亦可说通。尔后,研究者将虎人卣的鹿形钮与斯基泰文化中的动物纹饰建立联系,且认为童子的形象与当时所见秦器中的人形同属一类,因此判断虎人卣的年代为周后期。^④而至于虺龙纹,虽在命名中给予关注,却没有展开讨论。如今看来,虎人卣上的高浮雕龙纹显然属于夔纹,而虺龙一般所指较为平面、几何化的一种龙形纹饰,玉器中多为半圆雕圆环状^⑤,青铜器中一般指蟠虺纹,为春秋时期才开始出现的一种细密的交织纹饰。早期的蟠虺纹虽已图案化,但仍可辨识其目、吻部等结构;至春秋晚期,已经解构出高度几何化的蟠虺纹,头部仅以小圆表示。^⑥日本学者将虎人卣中的高浮雕纹饰视为虺龙的一个原因可能是对器物年代的预设。

1971年,内藤乾吉(内藤湖南之长子)再编泉屋藏品图录。根据序言,殷墟的大规模发掘和研究带来了许多新的认识,因此以往图录中的一些说法需要增补、校正,且时值泉屋博古馆建立十周年,于是,在两重契机之下,著《新修泉屋清赏》。梅源末治在这部图录准备期间已年近花甲,但依然参与了编撰和改订,可见《新修》之重要性,这也代表了殷墟之发现为日本学界带来的影响。^⑦

《新修》中“虺龙雷纹乳虎卣”改称为“鹿钮盖乳虎卣”。首先,内藤再次说明了“乳虎”二字的依据,即斗谷于菟的典故,且没有再提饕餮食人的说法。另外,描述也指出鹿钮的设计十分罕见,又在文末强调鹿形钮的立体表现为殷商特色。虽然文中没有直接说明器物年代,但在讨论中若

① 苏荣誉:《妇好墓青铜器与南方影响——殷墟青铜艺术与技术南方来源与技术选择新探》,载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编著:《商周青铜器铸造工艺研究》,1-68页,科学出版社,2019。

② 内藤虎次郎:《序》,载滨田青陵、梅源末治:《删订泉屋清赏》,住友家族,1934。

③ “初,若敖娶於邲,生斗伯比,若敖卒,从其母畜于邲,淫於邲子之女,生子文焉,邲夫人使弃诸梦中,虎乳之,邲子田,见之,俱而归,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谓乳谷,谓虎于菟。故命之曰斗谷于菟……”;杨伯峻认为邲即郢为古国名,在今湖北省,“梦”为楚之云梦泽在长江北岸的区域。参见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三》(修订本),745、746页,中华书局,2016。

④ 滨田青陵、梅源末治:《删订泉屋清赏》,71、72页,住友家族,1934。

⑤ 朱乃诚:《商代玉龙研究》,载《文博》,2021(3)。

⑥ 雷鸣:《中国青铜铭文纹饰艺术》,163-165页,湖北美术出版社,1992。

⑦ 住友友成:《序》,载内藤乾吉:《新修泉屋清赏》,泉屋博古馆,1971。

干次提及虎人卣器身的某一部分或某一纹饰与殷墟出土器物之间的高度相似，例如虎首，在研究者看来与侯家庄出土的石兽、青铜兕觥的盖首等形象一致；童子的面容与姿态和殷墟墓群中出土的人像也十分相似；更重要的是，其指出侯家庄一〇〇一号墓出土一件大理石材质的虎形雕塑与虎人卣的近似。^① 该石虎现藏于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高 37.1 厘米、长 21.4 厘米、宽 26.8 厘米。^② 石虎头部以及上半身的姿态与虎人卣十分相似，包括牙齿、立耳等几乎一致。然而石虎作跪姿，且其背部至胯下均开槽，或为与木结构相合（图 13）。显然，殷墟出土的各种玉制、骨制、石制动物为梅原等学者带来了新的思考。此外，《新修》还指出虎人卣背后的兽面与虎尾作为整体亦可被视为大象，如此的“背面观”说明了这一件器物无论前后，均具有观赏性。事实上，对青铜器观赏性的关注在日本藏的大量安阳出土鸛卣中亦有体现。收藏于泉屋博古馆、奈良博物馆等处的殷商青铜器中，可见一批纹饰精美的鸛卣，纹饰满布，甚至器底也同样饰纹，让人不禁思考这种在常规摆放中难以察觉之处饰纹的意图，以及其所启示的关于商周青铜器的使用和功能问题。

此外，两版图录中也均提及盛伯羲旧藏中有一形制特殊的卣，经描述基本可以确定为虎人卣。^③ 《新修》在虎人卣描述文末提及色努齐博物馆藏虎人卣与泉屋卣除了纹饰上的若干差异外，整体造型、表面锈色、盖钮造型等均高度相似，因此可推测为同时出土的对器。^④

色努齐博物馆藏虎人卣仅出现在一版图录中，于 1977 年由叶理辅主持整理。彼时，叶理辅已经掌握了两件虎人卣的基本信息，并做对比。他总结了当时已有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人虎关系的解读。罗振玉认为虎人卣中的虎为饕餮，因此器物表现的是猛兽噬人的写实场景，不具有神秘色彩；樋口隆康将其解释为将孩童被献祭给祖先的画面，虎代表着祖先图腾；梅原末治认为人的身份为邪恶的奴隶，而虎，或饕餮代表着部落氏族的守护者。叶理辅本人将虎与人的互动视为某一氏族部落的发源故事，而许多中国古代的部落起源都恰恰与人兽的结合相关。^⑤

随着材料的公开和传播，国内学者亦提出了对于虎人卣的解读。这些解读中有与先前研究相合者，亦有新观点认为该图像表现的是哺乳、保护等反映人虎之间和谐关系的情景。例如，李学勤认为虎具有神性，图像表达人神合一。^⑥ 另外，也有与神话对应的解释，例如，何靖认为虎人为《山海经》中的神兽穷奇食蛊。^⑦ 王祁补充指出，虎人卣背部的勾形扉棱为穷奇的飞翼。^⑧ 熊建华对比文献以及荆楚地区东周时期的漆画，认为虎人卣中的人为《山海经》中的珥蛇践蛇神，推论虎人图像为神人戏虎，即一种巫祝互动。该观点与张光直先生所述巫师通过虎而升天的巫觋说相类似。^⑨



图 13 石虎首人身跪姿立雕（正、背面）

图片来源：台北“故宫博物院”、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等：《武丁与妇好：殷商盛世文化艺术特展》，台北“故宫博物院”，2012。

①④ 内藤乾吉：《新修泉屋清赏》，62-65、64 页，泉屋博古馆，1971。

② 台北“故宫博物院”、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等：《武丁与妇好：殷商盛世文化艺术特展》，台北“故宫博物院”，2012。

③ “徐梧生鉴亟言，盛伯羲祭酒家藏一卣，形制奇诡，作一兽攫人欲啖状，殆象饕餮也。此前人记述古彝器图象者，所未知。”参见滨田青陵、梅原末治：《删订泉屋清赏》，71、72 页，住友家族，1934。

⑤ Vadime Elisseff. *Bronzes Archaiques Chinois au Musée Cernuschi vol. I-Tome 1. L'Asiatheque*, 1977.

⑥ 李学勤：《试论虎食人卣》，载四川大学博物馆、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编：《南方民族考古》第 1 辑，43 页，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

⑦ 何靖：《古器中的虎食人造型及穷奇见于商代卜辞考》，载四川联合大学历史系编著：《徐中舒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90-97 页，巴蜀书社，1998。

⑧ 王祁：《商代虎食人纹饰分类研究——兼论青铜器上的“飞翼”纹饰》，载《南方文物》，2020（4）。

⑨ 熊建华：《虎卣新论》，载《东南文化》，1999（4）。

至此,关于虎人关系的讨论尚未有定论,虎人图像的含义也就难以确定,各家之言均逻辑自洽。正如李学勤先生所言,由于相关古代神话材料的缺失,为虎人卣图像组合的含义定下一个绝对正确的结论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①然而,其出现在妇好墓青铜器中,尤其是作为阴线纹饰出现在兵器钺上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或许能为图像含义的讨论带来一些新的启发。安阳工匠使用这一纹饰母题时,其是否带有文化内涵?是对地区文化的吸收?对该地区的征服?或者安阳的虎人图像已不具备原始含义。如虎人图像般具有故事性、甚至宗教性的纹饰母题在商周青铜器纹饰中为极少数,不可因意义尚不明确就抛弃其文化性,而仅看重装饰性。它在安阳青铜器中的出现为文化传播在物质遗存中显化的难得案例,因其承载着比一般工艺技术和装饰纹饰更为复杂、深刻的文化内涵。

青铜虎人卣的个案的信息发掘,体现了商代长江流域的青铜文化向中原的传播,其主要反映在青铜器的工艺、风格,即技术和艺术方面;另外,可能在器物组合(成对器、成组器)、宗教文化(虎人图像)等方面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文化的交流自其开始便持续往复,要理清青铜器类型、风格的复杂发展规律,应首先把握不同地区文化之间的动态交流。虎人卣等动物形器将器与动物形结合,还关联到商周青铜器中另一类器物——觥。在一些著录和研究中,往往将动物形器归类为兕觥。^②对此,笔者将另外撰文讨论。

A Study on Their Manufacturing Technologies and Artistic Origins of Two *You* Vessels with the Tiger and Man Motif

SU Rongyu¹, DUAN Xiyang²

(1.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Natural Sciences, CAS;

2.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Natural Sciences, CAS)

Abstract: The two *you* vessels with the tiger and man motif in the Sumitomo and the Musée Cernuschi collections are both said to have been found in Changsha, Hunan Province. They are the prominent representatives of Shang bronze art, well-known for their design with a tiger-devouring-man motif. This study offers an in-depth investigation on their craftsmanship with the CT scans of these two vessels as well as a comprehensive examination on their forms, decorations, and the details of their motifs. The analysis on their stylistic features, artistic expressions, and technical characteristics shows that these two vessels were southern-style Shang bronzes were probably made by the same artisan or the same group of artisans, in the Yangtze River Valley prior to the Yinxu era. The tiger and man motif was especially favored in the Yangtze River region during the Shang. This study also examines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Yangtze River Valley and Anyang during the Shang.

Key words: Shang bronzes; *You* vessels with the tiger and man motif; Southern style; Casting technique

(责任编辑 张 静)

① 李学勤:《试论虎食人卣》,载四川大学博物馆、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编:《南方民族考古》第1辑,42页,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

② 王国维:《观堂集林·说觥》,147页,中华书局,2004。